**《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读书笔记**

[序 1](#_Toc536689490)

[第一部分 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 2](#_Toc536689491)

[第一章 村、集市和乡镇 2](#_Toc536689492)

[控制的问题 2](#_Toc536689493)

[中国乡村的形态 2](#_Toc536689494)

[村庄的物质面貌 3](#_Toc536689495)

[乡村集市与城镇 3](#_Toc536689496)

[第二章 基层行政组织体系——保甲及里甲 4](#_Toc536689497)

[保甲组织 4](#_Toc536689498)

[里甲组织 4](#_Toc536689499)

[保甲和里甲之间的关系 4](#_Toc536689500)

[作为乡村建制的社 5](#_Toc536689501)

[第二部分 乡村控制 5](#_Toc536689502)

[第三章 治安监控：保甲体系 5](#_Toc536689503)

[保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5](#_Toc536689504)

[乡村绅士与保甲 6](#_Toc536689505)

[保甲体系试评 6](#_Toc536689506)

[第四章 乡村税收：里甲体系 7](#_Toc536689507)

[里甲在税款摊派和登记中的地位 7](#_Toc536689508)

[对里甲体系的总评价 8](#_Toc536689509)

[第五章 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 9](#_Toc536689510)

[清朝的粮仓体系 9](#_Toc536689511)

[地方粮仓的组织和运行 9](#_Toc536689512)

[乡村粮仓体系的衰败 10](#_Toc536689513)

[粮仓体系所面临的困难 10](#_Toc536689514)

[绅士与乡村粮仓 11](#_Toc536689515)

[摘要和结论 11](#_Toc536689516)

[第六章 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 11](#_Toc536689517)

[乡约宣讲体系 11](#_Toc536689518)

[乡饮酒和其他敬老的方法 14](#_Toc536689519)

[祭祀：地方祭祀。 15](#_Toc536689520)

[乡学 15](#_Toc536689521)

[乡村控制的局限 16](#_Toc536689522)

[第三部分 控制的效果 17](#_Toc536689523)

[第七章 乡村控制的效果 17](#_Toc536689524)

[作为共同体的村庄 17](#_Toc536689525)

[村庄领导 17](#_Toc536689526)

[村庄活动 17](#_Toc536689527)

[村际活动 18](#_Toc536689528)

[村民的合作活动 18](#_Toc536689529)

[绅士在村庄中的角色 18](#_Toc536689530)

[总结 18](#_Toc536689531)

[第八章 宗族与乡村控制 19](#_Toc536689532)

[宗族与村庄 19](#_Toc536689533)

[成员与领导 19](#_Toc536689534)

[（三） 宗族活动 19](#_Toc536689535)

[政府对宗族的控制 20](#_Toc536689536)

[宗族组织的衰落 20](#_Toc536689537)

[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一） 20](#_Toc536689538)

[乡村居民的一般特点 20](#_Toc536689539)

[乡村环境 20](#_Toc536689540)

[西方对中国乡村环境的影响 21](#_Toc536689541)

[第十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二） 21](#_Toc536689542)

[良民 21](#_Toc536689543)

[莠民 21](#_Toc536689544)

[西方的声音 23](#_Toc536689545)

[第十一章 结论与余论 24](#_Toc536689546)

[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和效果 24](#_Toc536689547)

[专制统治的局限 24](#_Toc536689548)

[农民的角色 25](#_Toc536689549)

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1981年11月4日），原名笃平，自号迹园，笔名君衡，江西泰和人，中国现代政治学家。1920年，自[清华](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1832793" \t "_blank)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密苏里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6%E8%8B%8F%E9%87%8C%E5%A4%A7%E5%AD%A6/4627311)新闻专业和[康奈尔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A%B7%E5%A5%88%E5%B0%94%E5%A4%A7%E5%AD%A6/567130)哲学系。1926年取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北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E5%A4%A7%E5%AD%A6/18014" \t "_blank)、[燕京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4%BA%AC%E5%A4%A7%E5%AD%A6/198383)、[清华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5%8D%8E%E5%A4%A7%E5%AD%A6/111764)等校任教。抗战爆发后，迁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7%9D%E5%A4%A7%E5%AD%A6/160426)、成都[燕京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7%95%E4%BA%AC%E5%A4%A7%E5%AD%A6/198383)、[光华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5%8D%8E%E5%A4%A7%E5%AD%A6/6255498)，抗战胜利后继续在[光华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9%E5%8D%8E%E5%A4%A7%E5%AD%A6/6255498)及四川大学任教。1948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1991121" \t "_blank)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7%9B%9B%E9%A1%BF%E5%A4%A7%E5%AD%A6/2620874" \t "_blank)教授，1968年循例退休。1981年11月4日，逝世于美国[西雅图](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9%9B%85%E5%9B%BE" \t "_blank)寓所。

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思想史](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6%94%BF%E6%B2%BB%E6%80%9D%E6%83%B3%E5%8F%B2/9179085)》、《中国乡村》、《宪政与民主》、《康有为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维新》

## 序

本书研究19世纪清王朝在中国乡村的**基层统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尽管存在未涉及的帝国某些少数民族或边远地区的乡村居民，但依然希望较清楚地呈现出**清帝国乡村统治体系的一般状况**。

该研究可以满足几个目的：

1.**充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作为农业大国，乡村居民在总人口中占比大，不考虑政府对亿万乡村居民的影响及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下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就不能充分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

2.**了解19世纪特殊的历史时期并提供后续历史发展线索。**19世纪是王朝崩溃和政治转向的时期，研究这个时期的乡村，弄清一些造成中国帝国统治体系衰败的力量和因素，或许还能提供一些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有用线索；

3.**现有研究充斥歧异，需要系统处理和研究。**有关19世纪中国乡村生活的描述和议论不少，但大多不是经过认真仔细的调查得出的结果。很少有人对观察到的现象下功夫分析分析，甚至存在错误的概念与解释；

4.对于帝国一般行政体系的论述很多，但对最低行政体系/基层统治体系解结构和功能，相关**中西文著作都相当少**。本书极力想弄清：**帝国政府是如何控制乡村居民的？乡村居民对这种控制的反应如何？自然和历史环境又是如何影响到基层统治体系的运转，以及在该统治体系之下乡村居民的行为举止如何？**设法对中国乡村问题提出适当的观点，消除在一些领域非常流行的错误观念。

史料来源：

1.只要有可能，对每份史料所涉及的地方和时期都要说明；

2.取舍资料必须谨慎。

**官方资料**可能存在的言过其实、隐藏问题、粉饰太平；

**地方志**客观性真实性比官方文献高，但也存在修篡者有失偏颇、弄虚作假、粗心大意；

**私家著述**比起官方文献享有更多自由，但也不保证它们存在偏见；

**西方作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描述更为生动，但也存在受原生影响、叙述误解或混乱；

某项资料可清楚显示19世纪情况、缺乏直接资料，会**部分引用**19世纪以后的材料。

## 第一部分 乡村地区的行政划分

### 村、集市和乡镇

### 控制的问题

帝制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统治者与非统治者之间的界限相当清楚，其利益背道而驰。因此，**专制统治者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保持对臣民的牢固控制**，以确保自己及其子孙的皇位做得安稳。

从秦朝到清朝，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于建立一套行政组织，帮助皇帝确保臣民的顺从并防止反叛。采取：

* 保障臣民基本物质需求，防止他们因为难以忍受的生活“铤而走险”；
* 反复向臣民灌输经严格筛选的道德教条（多儒家），使臣民接受/认同现存统治秩序；
* 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采取措施。

自秦始皇以降，帝国控制基本原则没有变化，但统治体系由于日积月累不断精炼、提高，表现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法律规章更加详细，监视更加严密，控制更加严厉**。

为了统治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帝国统治者建立了一套精心设计的行政架构，皇帝处于最顶端（统率中央官僚组织，包括内阁、军机处和六部），其下是庞大的官僚群；通过地方政府组织，帝国政府的行政命令从北京传到整个中华帝国的各个角落。18个省份都被恰当分为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即府和州县。巡抚一般是一个省的行政首长，由布政使（财赋）和按察使（刑）辅佐。一府最高为知府，州县分别为知州和知县（“地方官”、“亲民之官”）。

* 操纵官僚群体。为有效控制行政组织机构，采取各种措施。例如，每一重要职位都有两名，或更多官品相等、权力相同的官员来分享；一个高级官员常被安排兼任一个以上职务。；不能在家乡省区任职。
* 维持众多城镇、数不清的乡村秩序。由于地域广阔、交通不便、“无知乡人”，同时知县的管辖范围超过1,00平方英里，每名管辖10/25万名居民。因此普通行政组织不切实际。
  + 从当地居民/宗族中选取可用之人，设置保甲（警察）组织体系、里甲（税收）组织体系；
  + 为防止势力膨胀，采取抑制措施，每一个地方的代理人或组织置于知府的控制或监督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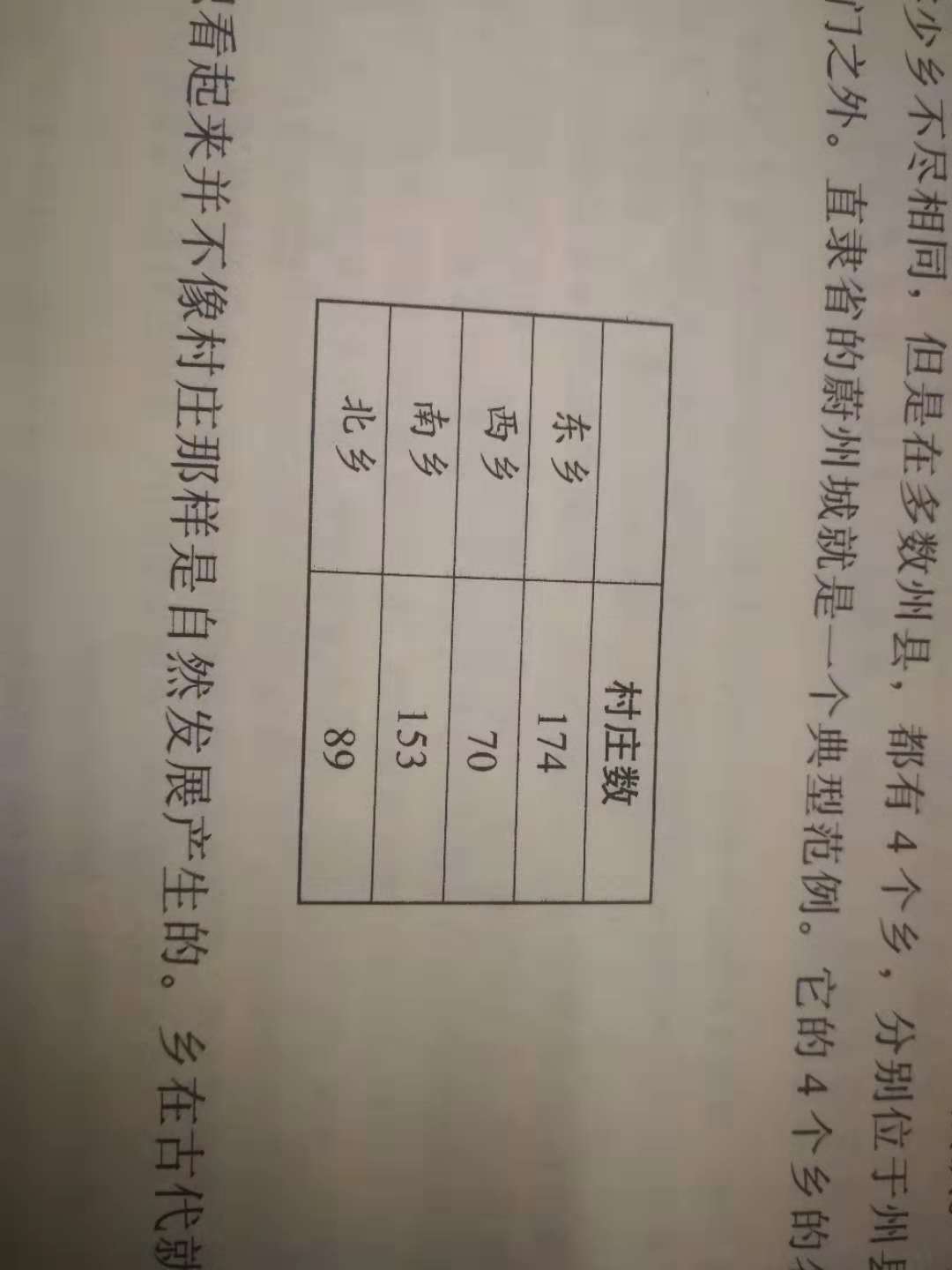
评价：准确评估时有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清朝统治的稳定，但存在一些严重缺陷——甚至曾采取该体系的所谓优点，长远来看成了这个体系的缺陷。

* **清政府无法为统治乡村提供有效运行的先决条件。**整个专制体系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统治者关心帝国安全——权力在手+不给官员开创、独立、权威的机会，导致官员情绪低落。
* **乡村控制创造出削弱帝国乡村统治基础的状况。**控制农民相当容易——他们几乎不识字、不主动或不进取。挑选当地居民控制基层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由于他们没有为官府效劳的意愿，反而为自己谋求私利，造成了实际运行中的失败。
* **政府监督**由于僵化、不给地方自由裁量，导致居民以一种漠不关心、怀疑、害怕的眼光，对待政府的任何事情。
* **通俗易懂的教条达到某些效果，本质上是负面的。**教导农民保持“保守主义”，在内心服从专职，而不是提高自身能力，使得中国乡村在智慧、经济上停滞不前——**清政府的基础随这种统治的进展被削弱**。

### 中国乡村的形态

中国乡村并不是紧密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也不是毫无章法的——环绕城周围的是广大的乡村地区——乡，包含了乡村生活的许多组织和中心，大多数集中居住在聚居村落（村或庄）、乡间集市（市、集、场等）和城镇（镇）里。

* **村庄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如同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构成单位一样。
* 由于村庄在经济上不能自给自足，较大村庄形成了“商业街”（一长串小店组成），但这些村庄以及小村庄必须依靠附近的集市解决商品交换和服务。**集市大小结构不同，定期举行贸易活动，最终成为具有经济功能的村庄**。保留了乡村的基本特征，大多数居民还是农民。
* **城镇**通常从乡村集市发展而来，随着一个乡村的经济活动扩张，成为一个可以为相邻乡村提供商业服务的贸易活动中心。城镇（不是纯粹简单的村社）有两种类型：贸易型与制造型。
* **乡——**乡村区域组织。包括一系列村庄、集市或许还包括以两座城镇，每个州县有多少乡不尽相同，但在多数州县有4个乡，分别位于州县城的四座城门外。可能不是自然形成的，是源于政府设置，在乡村控制中可能被用到的行政单位。



### 村庄的物质面貌

村庄自然发展而形成的事实，就是它们缺乏一致性的原因所在。

* 地理条件对村庄的影响。例如，古伯察对华中省份和西部省份；湖北省和四川省乡村的描述；华北的“聚居型”、华南的“散居型”
* 经济条件影响村庄分布和大小的差异。一名英国军官对东北调查显示，乡村之间是相距很远还是鸡犬相闻，与土壤肥沃程度有关。
* 地理位置。良好的地理位置使乡村免于水患或位于村中的粮仓带来经济繁荣，使得村规模大。一些较大的村，人口甚至超过5000人。

**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耕地的数量随着人口数量变化而变化。

### 乡村集市与城镇

中华帝国的不同地方，集市的名称不同。华北集市叫“集”（聚集），华南集市称“墟”，西部则称“场”。明恩溥曾记录，大城市集市每天开放，乡村可能是隔天或一个月几次。

* 通常集市设在买卖者走路就可以到达的地方，或路程不是很远的邻近各县。乡村集市通常坐落在离县城很远的地方，县城则拥有自己的市场。
* 由于各地繁荣程度不同，州县拥有的集市数量不同，从十几个到几百个不等。
* 集市上交易的货物，大多数为当地的物产。人少或落后的地区，交易就仅限于少数种类。

***“自米、粟、鱼、盐、布、缕而外，无他异物”***VS***丝绸、布、家蚕、家禽、鱼等等，杂货店1,500多家，“万货丛集”***

* 镇是乡村地区几乎最后一种自然形成的单位。例如景德镇。这些城镇在形式上属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最后一部分，并没有并入城市，但这种体量和类型的镇，已经不再是标准的乡村社会了。

### 基层行政组织体系——保甲及里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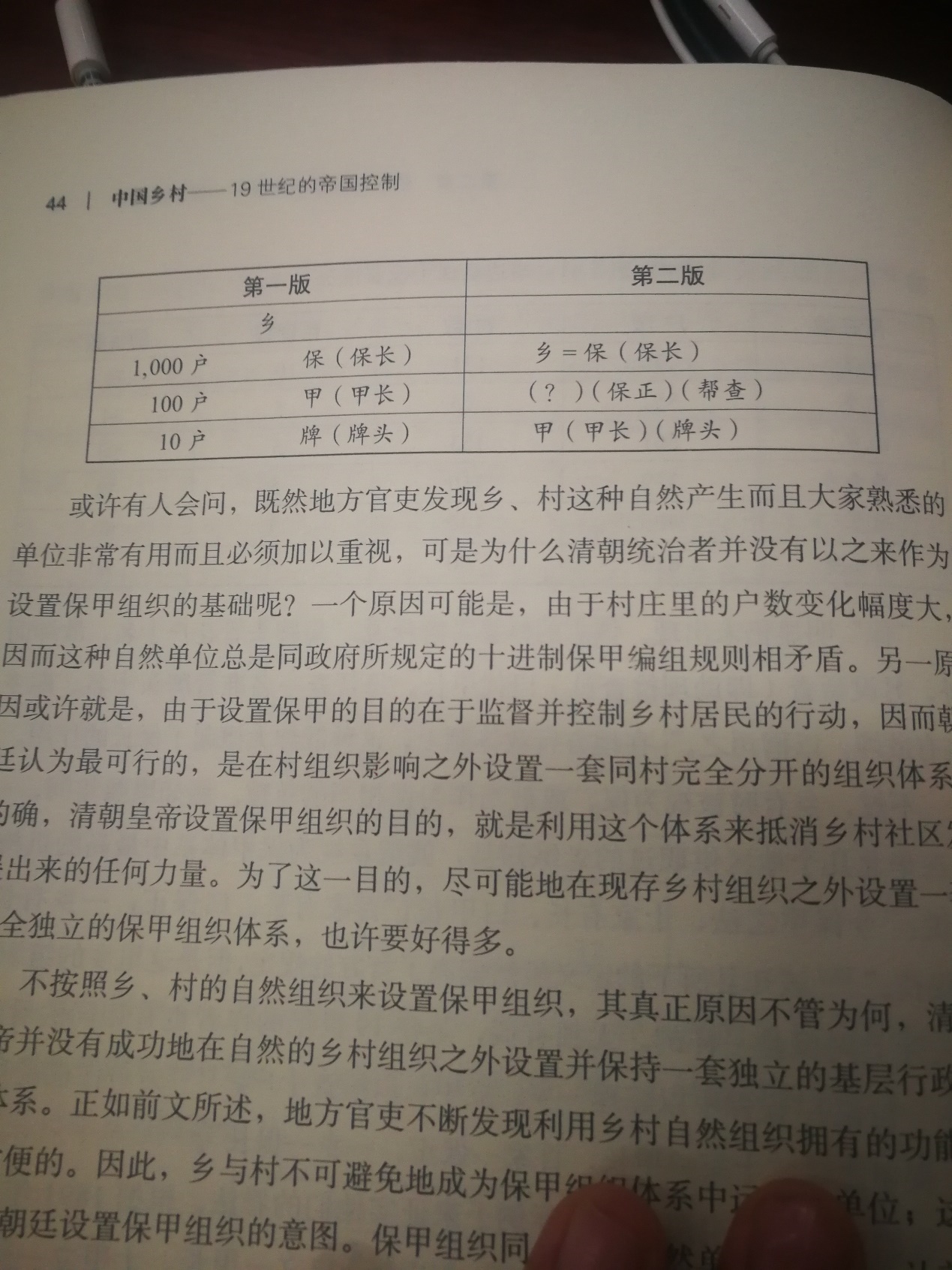
为了有效控制乡村，确立了两大基层组织体系。一方面确定了**保甲组织体系**，用于推行控制治安的事务；另一方面确立了**里甲组织体系**，该体系最初设置的目的在于帮助征收土地税和摊牌徭役。

\*由于官方方案在应用时缺乏一致性，以及体系在自身运行中发生了变化，在名称和实际运作中都产生了相当多的混淆。有认为是同一个组织体系，混乱使用。

本章试图概括保甲和里甲这两大基层行政系统的结构特色，指出**在名称使用上缺乏一致性，偶尔相互重叠，但他们原本就是两大不同的体系，各有清晰的功能**。

### 保甲组织

* 《周礼》：***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郭…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sè），***功能不仅限于密切监视居民以维持地方秩序的治安功能。
* 《管子》：被赋予更广泛的诸如军事组织和维持地方秩序的职能
* 秦汉及其后各个王朝，通常直接依照《周礼》的安排，设置地方行政组织。
* 公元589年，隋文帝，引入“检察”的概念；
* 唐王朝，率先将人口统计、征税和治安管理等职能同时结合在一起（强调最后一种）
* 宋王安石1070年创立保甲，首次使用“保甲”这个名称，首次将警盗、切结联保当做保甲的唯一职能。推行速度快，大约在创立一年之后，就转变为一项辅助性的军事制度，和一种永久性的地方民兵制度。
* 明王守仁，推动保甲成为一种**地方**治安体系。每10户一组，将家庭成员的名字登记在门牌上；邻里之间有面生的就要报官；如果出现了任何失职，10户就要连带负责。
* 清王朝当作清查当地居民人口、迁移与活动的工具。**10户为1牌，10牌为1甲，设甲长（甲头），10甲为1保，设保长（保正）**
* 最晚到19世纪，实际上有两个版本的官方保甲方案中提到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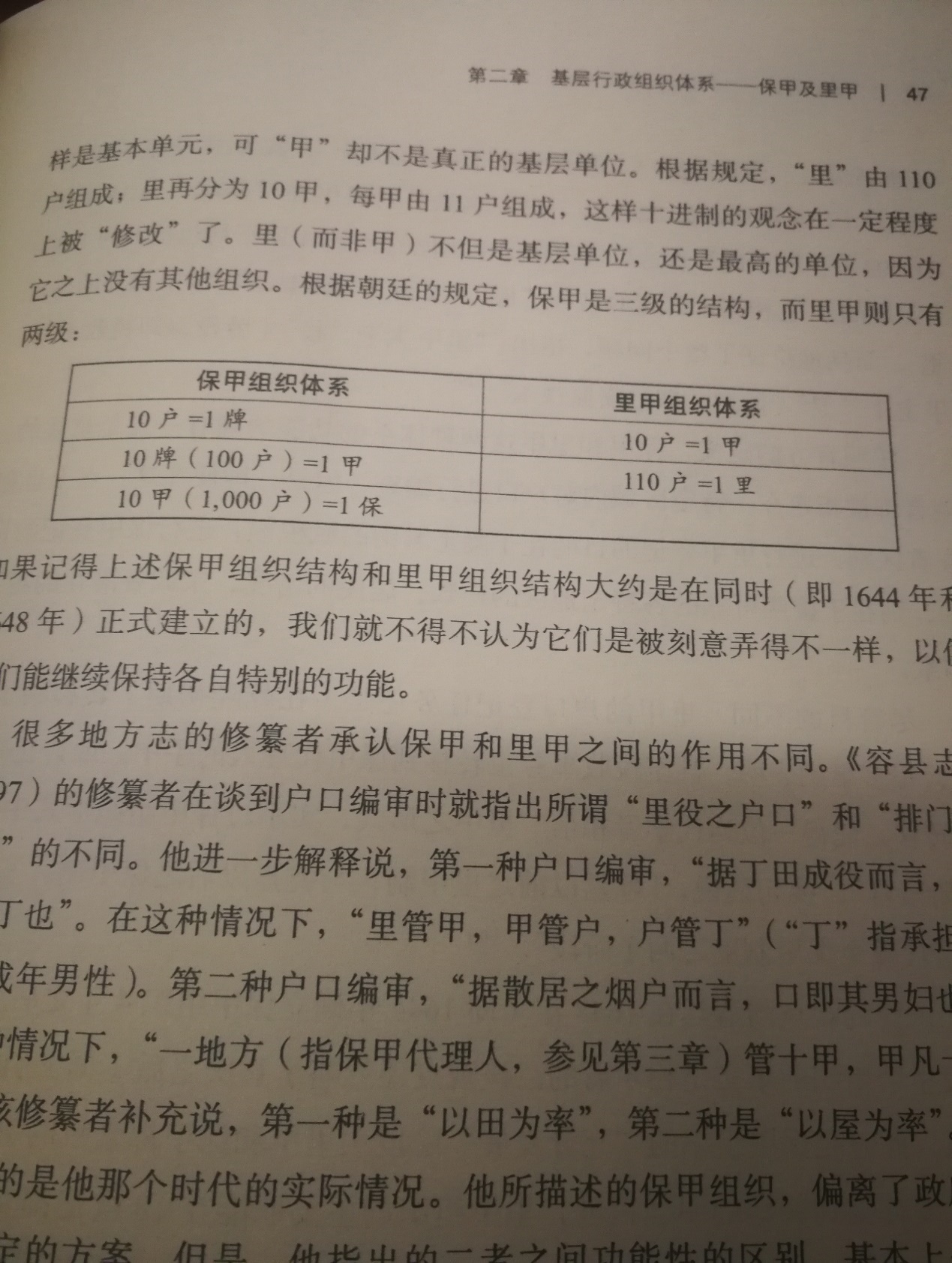


### 里甲组织

* 顺治帝设置于1648年，即保甲成立后4年。可直接追溯到——明朝的里甲——元朝的里社。
* 根据《明史》，太祖下令编撰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在万历年间正式命名为“里甲”。
* 没有得到严格的推行，也没有一致地使用在全帝国的所有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及以南各省与官方方案和名称一致的更少。

### 保甲和里甲之间的关系

* 从法律来看，保甲和里甲是服务于不同目的的两种体系。《大清律例》中，保甲是在刑律（主要处理犯罪和凡人的刑事法典），里甲是在户律（关于财政和人口的法律）——表明清政府将保甲和里甲是为功能各不相同，相互独立的两种体系。
* 在组织结构上，二者编组大体类似，但并不相同。虽两者都以“甲”为底层单位（这是产生混乱的原因之一）。
  + 在官方的保甲（警防）体系中，每甲由10牌组成，每牌由10户组成，因此，户是基本单元，牌是基层单位，十进制的观念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
  + 在官方的里甲（赋役）体系中，里由110户组成，里再分为10甲，每甲由11户组成，尽管户同样是基本单位，但十进制被修改了，里不但是基层单位，还是最高的单位。
  + 创世时间相近（1644/1648），且保甲三级，里甲两级，可以认为是刻意不一样。



* + 不过按照官方定义，也有重叠的地方，即里甲的户口登记任务在乾隆初期，转移给保甲，甚至税收实务也转移到保甲代理人的手中。

### 作为乡村建制的社

该概念至少同保甲和里甲中之一有某种关系，但概念不同。

* 最早出现在《左传》
* 隋朝成为向地神和谷神举行祭祀活动的单位
* 隋唐同乡村的粮仓联系在一起，承担了赈济饥荒的任务（基层组织中非常重要的工作）
* 元朝成为正式成立的农业事务的中心
* 明朝，社的规模扩大，控制乡村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规定每100户组成一社，每社修建一个祭坛，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甚至成为皇家控制人民的工具。
* 清朝，接近于元朝的体系，主要是一个提高或促进农业生产的组织。经常与里甲结合在一起，即里社。

清廷在1660（顺治十七年）采纳一项关于在帝国农村地区设置里社的建议，毗邻居住的多少不等（20~50户）的人构成一社，这样每个区域的居住户“每遇农时，有死丧病者，协力耕作”。

## 第二部分 乡村控制

### 第三章 治安监控：保甲体系

### 保甲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为了坐好天下，清王朝统治者并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还吸取和采用了以前各王朝发展起来的统治技术和规章制度——继承和吸纳了明朝遗留下来的整个行政体制和基层行政体系，并做了看起来必要的修改，保甲就是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最为重要的基层统治体系中的一大组成部分。

* 建立时间，顺治元年（1644）。方法如下：“***州县城乡，十户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其属于一种登记制度，目的在于加强生活在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进行统治。
  + 此外还设立了**总甲体系**。不过该体系由兵部监督执行，保甲体系由户部监督执行，且在组织结构上有不同。总甲体系在新王朝巩固统治并设置好统治体系后消失，保甲体系依然保留。
* 到18世纪初期，保甲牌组织明确设置起来了。有力的帮助清朝皇帝加强对县以下基层的统治。
  + 首要职能就是要对各街坊和村子的民户、丁口进行编审——表面上看是人口普查，又不仅仅是人口普查——即要求被登入户和登录的人履行以下治安职责：监视、侦查、汇报所在地区任何可能发现的犯罪或犯人。
  + 第二大职能（或许是中心职能），是侦查、汇报犯罪行为（那些反抗统治秩序、搅乱地方统治的犯罪行为）。一旦出现“***盗贼逃人，奸究窃发***”，居民必须向保甲头人汇报，保甲头人再向当地官员汇报，否则不仅个人受惩罚，其他9户也要受到惩罚。
  + 保甲组织的一大特点是由各地编组居民自己进行管理，地方官员只负责监督，并不直接参与。优点在于通过寻找本地居民帮助减少官员增设；保甲组织置于地方官员监督之下，防止保长、甲长手中权力过度膨胀。这种制度使得每一位居民成为**间谍**，不仅帮助政府减少罪犯，也同等效果对臣民形成威慑。
* **实际功能没有达到理论上的作用。**尽管皇帝从17世纪就开始强化保甲，如18世纪雍正帝极力将保甲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变成全国性的监视制度，到19世纪，“盗匪”和反叛不止在一个地方发生，清政府还试图把它打造成战胜“邪教”和秘密社会的武器，最终不能承担对付范围广、规模大的社会动荡的任务。
  + 嘉庆帝十分关注修正保甲制度，但到其之后的清朝皇帝并不关注这项制度。
  + 部分地方官员对保甲抱有热情，可能是推行保甲是衡量其政绩优劣的标准之一。
  + 由于地方没有认真遵循朝廷对保甲体系的规定，在组织形式和术语上都产生了混淆，例如使用“甲—保—乡”替代“牌—甲—保”，导致保甲体系在地方治理破碎，几乎认不出来。
  + **里甲组织的税收功能转由保甲组织来承担**——部分原因还是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里甲职能由保甲取代，导致保甲不能恰当履行自己原来的职能（曾国藩）。
  + 还曾出现地保——清政府统治乡村的负责人。
* 保甲体系经过数十年的解体，在一些地方作为地方保护组织的基础获得了新生，但不能认为这样产生的组织标志着清王朝乡村统治体系的复兴。保甲体系渐渐丧失了许多实际作用，19世纪末期，其停止运行

### 乡村绅士与保甲

* 清王朝坚持把绅士和文人阶层置于保甲组织控制之下。
* 一方面，如果不把绅士同普通人区分开来是愚蠢的；另一方面，给予他们控制地方的权力也是愚蠢的，因此清政府采取把保长和甲长的职务让给普通人的措施。
* 尽管清廷规定保长、甲长的职务不能由绅士来担任，但在实际中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宗族势力大的地区刚开始会阻挠保甲推行，随着19世纪各地骚乱、反抗严重，绅士也开始重视保甲组织，地方官员在18世纪末也认识到利用绅士阶层帮助推行保甲体系的重要性。

### 保甲体系试评

* **保甲体系得到统治者与官员的抱怨。**
  + 清王朝统治者也在随时评估保甲体系的推行效果，他们是悲观的——康熙帝抱怨由于官员们没有集中精力来推行保甲，使得其效果不佳。
  + 许多官员的评论同皇帝一样悲观。“***各省有司，非不循例奉行，乃闾阎之间，仍属奸良莫辨，即今日匪案之发觉，由于保甲之举首者甚少***”
* **保甲体系在运行中环境逐渐缺失。**一方面，保甲体系推行实施的环境逐渐消失：农民经济不要求富足，但大多数必须免于饥寒之苦；官员们不需要全部都能干廉洁，但必须要求大多数防止普通百姓生活条件在他们任上恶化到难以承受。这些条件到19世纪渐渐消失，使得保甲同样快速崩解。
* **保甲体系在19世纪之前也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如登记门牌方法、根据门牌编辑保甲册、制作门牌和登记册、基层报价组织负责人定期到县衙门汇报执行困难，同时为保甲组织补充合格人才较难实现。

### 第四章 乡村税收：里甲体系

### 里甲在税款摊派和登记中的地位

#### 清王朝的服役制

税收在清王朝的行政体系中，是最急切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其极为重视税收的分派和征收、并设置一套适用的工具。里甲就是这套税收工具中的组成部分。最初帮助登记向村居民人数，以便利于摊派徭役，后来就用来协助在乡村征税。

徭役是对私人所拥有的耕地课的税（“民夫地”、“民地”），税率固定，据土壤肥瘠程度决定，亩是征收单位。或以实物，或以货币来抵缴。

顺治时期初期税额不高，在不断征收附加税的过程中常比正常征税的税额要高出几倍。具有生产能力的“民地”拥有者，包括官员、乡绅、士子，都必须缴纳土地税和附加税。

和以往各朝代一样，必须承担徭役的居民称为“丁”——16-60岁之间的成年男子。清王朝经常强迫已经缴纳丁税的百姓承担额外的劳役，其中一些不能通过缴纳免役税加以免除。保甲和里甲就是这类“役”中最突出的两项。

为了掌握全国可以承担徭役的总人数和个特定县区承担徭役的人数，政府就要必须编辑特别的“户册”或“丁册”，载明全国可税人数。性质同明朝黄册一样。

#### 里甲及“黄册”的编制

编辑“丁册”或‘’黄册”的程序被称为编审（编辑和审查），每个三年，对帝国全境的户口和居民做一次调查，州县官员要负责编辑当地的登记册——必须详细检查每个里甲的名册，以保证能够清楚表明旧有的人口总数，被删掉的和增加的民人姓名，由纳税义务的人数及征税的总数，丁口人数比上一期数字增加2,000口以上，就会得到奖励，以人口增加或减少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标准。

实际上，里甲未能把所有纳税者的名字都登记在丁册上，劳逸额不足时有发生，“缺额人丁”。

*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采取了一个关键举措：按照当年登记人册情况，把丁口数额永久地固定下来。大大降低了里甲组织作为黄册编辑的辅助型工具的意义，统计居民人数的程序因此变成一种对人口进行的一般普查，而不再是确认可税丁口确切情况的方法。
* 另一项决定性政策，1672年（康熙十一年）以来，各地方陆续把丁税连同土地税合并在一起征收。黄册以前拥有的许多作用就消失了。

清朝皇帝们放弃了为了税收而要弄清生活在清帝国乡村中的人数的所有努力，里甲虽没有同黄册一同被废纸，但已经失去了最初、读的的协助编纂乡村丁册的作用。

#### 赋役合并对里甲的影响

原本为了登记某一特定乡村地区丁数而设立的里甲组织，随着土地和劳役的整合而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方，可税土地数成为里甲组织设置的基础。

#### 里甲作为登记辅助工具的效果

里甲存在于1648-1772年，不过这一段能找到的史料中基本没有记载。

在里甲组织登记程序废止之后，以保甲登记册为根据而变成的人口登记册，并没有比以前根据里甲的资料更为精确，每年上报北京的胡舒汇报，大体上是捏造出来的。

#### 里甲在税收上所扮演的角色

里甲组织原来的功能是定期协助地方官编制黄册——登记各地有义务缴纳丁税的丁口数的册子。然而，**里甲组织最终同税收程序联系在一起，而完全停止执行其最初的职能**。

进一步考察里甲组织职能的变迁过程，将征税总程序分为三大阶段：正式通知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收税（实物缴纳或折算成相应金额税款）、将各地征收的税上交中央政府。里甲组织只在前两个阶段起作用。

* 催科：缴税前一个月就要向每个纳税人下达一份“易知由单”的文件。由于州县官府完成“催科”不现实，他们使用三种方法完成：把差役派到每个里去；利用里长或甲长（明朝的翻版）；指定一些纳税户的户主充当“催头”。
* 收税：程序简单，纳税人将其应缴纳的税钱放于安在衙门大门前的木柜里，官府向完成缴税的人签发收据。

**里甲重演了保甲体系的故事：从诚实乡人中产生的里长甲长，成为衙门走卒的牺牲者；从流氓恶棍中产生的人选，则导致乡村社会中产生种种不法行为，使纳税人成为牺牲品。**

### 对里甲体系的总评价

#### 税收问题

里甲失败的原因绝大部分在于其所运行所处的社会环境。为了讨论方便，把户口登记、税额摊派、征税等归为两大类问题，并讨论地方官员和衙门走卒的行为，乡村绅士的参与：

* 一是伴随税收摊派和登记来的不法行为。

在有关徭役摊派与募集问题上，清廷法律规定和地方实际做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地方官要对此负直接责任。在里甲代理人出于任凭衙门摆布的情况下，希望他们来执行倾听法律的规定，是不明智的。

* 二是伴随着“催科”和其他征税程序而来的不法行为。
  + 在衙门走卒接到“催科”任务后，巨大的苦难就降临到纳税人的头上了。差役经常“***入乡叱哮，坐索酒食***”；一些一心为民的官员有时设法约束这种恶性，但收获甚微。
  + 衙门书吏和差役狼狈为奸。敲诈者有事过高估计了受害者的经济实力，导致乡下人会选择唯一的解脱方法——自杀
  + “中饱”，在纳税人缴税时索取额外税或玩弄、操纵税收收据
  + 清政府准许以货币代替实物交税的做法所衍生出来的，铜钱兑换音量过程中，地方级衙门走卒玩弄银子兑换率。清王朝建立初期，700铜钱兑换1两银子，到后来咸丰、同治帝在位5、6,000铜钱兑换1两银子。

**面对种类繁多、横行全国、地方官员及衙门走卒都卷进去的不法行为，负责里甲组织的人，并不能改变什么——因为他们也只是在县以下基层组织重服务的普通纳税人**。

#### 地方绅士与税收制度

**绅士妨碍了税收制度，特别是里甲体系的正常运行。**——此处绅士，指曾任过官职的退休官员、大地主和士子文人等。拥有大量土地、有义务缴纳的绅士，利用特权保护自己不受差役或者税吏的侵犯，官吏的敲诈勒索就转移到普通百姓头上，甚至绅士与官吏、衙门走卒狼狈为奸。

实际上，清王朝也给予官吏和审视种种特殊免税权和其他特权（推迟，甚至免除），使他们处于优于人们大众的地位之上。即使清王朝采取措施设法终止绅士拖欠缴纳土地税的不法行为，最终没有产生威慑作用。而一些享有特权的人，对清政府规定的冒犯，远远超过单纯地逃避他自己应承担的税额。以致19世纪中叶，清帝国几个地方都爆发了隐身是非法行为而引起的暴动。

#### 不法行为对清王朝财政收入的影响

不缴税自清王朝建立以来就存在，尽管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清政府财政的崩溃（政府总收入除了“地丁”、“漕粮”，还有关税、盐税等），但土地税和徭役税占财政收入的急剧下降（70%-30%），使得作为滴定税收辅助性工具的里甲组织，也丧失其在清王朝税收体系中的最初地位。

其造成严重的困难：为纳税人带来源源不断的痛苦、形成社会危机，清政府失去大部分的威望，引起仇恨、最终引发地方混乱——太平天国。

### 第五章 饥荒控制：社仓及其他粮仓

### 清朝的粮仓体系

维持清政府足够收入的最佳办法就是保障百姓的缴税能力，因此请政府注意**保护农人的土地**，推行垦荒、保护水利（包括灌溉和防洪）等措施；**设法减轻农人频繁遭受的苦痛**，帮助他们预防自然灾害；对灾害地区的纳税人，依法**准许延期或豁免税赋**；还建立**地方粮仓体系**，以备极端情况分发给农民。因此，在清朝整套乡村统治体系中，**灾荒控制**所占地位非常重要，清政府对它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保甲或里甲。

要论粮仓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尤其注意分布在乡村的粮仓。清朝建立三种地方粮仓：

**常平仓**：常设的正规粮仓；**义仓**：公益粮仓或设在乡镇的粮仓；**社仓**：社区粮仓或乡村粮仓。常平仓所贮藏的粮食部分来自官府，主要由官款购买，也接受乡绅富民的捐献，设立在州县；义仓和社仓主要来自私人捐赠，义仓主要来自乡镇或乡村集市的商人捐赠，实质是政府性质的，有地方官员直接管理，不一定设置在城市，社仓主要是乡村邻里捐赠，有各地居民自行管理，都分布在乡村。

### 地方粮仓的组织和运行

#### 常平仓

* 设置在1655年，每州设立一个或以上的政府粮仓，，由当地知州或知府负责管理，所贮存的粮食（大米、小麦、高粱或其他粮食），部分由政府用官款购买，部分由关心粮仓事业的私人捐赠。
* 在某些省份会任命“仓大使”负责监督、视察每省粮仓的运行情况。
* 每个粮仓贮存情况都有章可循，大县5,000石，小县3、4,000石，全帝国贮存量大约在30,000,000石和48,000,000石之间。
* 运行方面：
  + 秋收之后都必须在当地、邻近地方购买。在丰年购买清政府还会专门拨出一笔款，激励“乡绅富民”贡献粮食；
  + 粮食指出采取**“平粜”**（平价卖出）、**“赈借”**（救济性借给）。为避免粮食腐烂，每年春季和夏季要低于市场价格售卖一定量（约30%）的存粮，秋收后再补充新粮。也会根据饥荒情况和市场供求情况调整价格和数量，并建立惩罚制度。
  + 不过很多管理并不关心，甚至基本没有执行。存在管理的欺诈和盗用行为，使得许多常平仓贮存量未达到清廷所规定的的标准。皇帝们发现常平仓的***“有名无实”***
* 其衰败的证据在于存粮的逐渐耗尽。1766年的数量就低于规定了，1835年只有规定量的一半，到“***听任仓库空空如洗***”、“***破败不堪***”。常平仓在清朝崩溃之前实质上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 义仓

* 设置在1654年，1679年清政府颁布的命令，清楚地标明了该两大粮仓的基本特点：地方官劝说官神市民捐献粮食，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
* 特点在与由当地居民管理，完全为设立它们的当地农人服务，禁止赈济邻近乡镇或县城/出借。
* 有一种特殊的义仓是由商人管理，坐落在人口稠密的乡镇或大集市里；盐义仓。
* 义仓作为灾荒控制的工具实在难以评价。地方官员的热心可以为它带来繁荣，漠视也可以削弱义仓生命力。19世纪尤其是太平天国之役后，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 社仓

* 有时社仓和义仓被混为一谈。尽管也设置在1654年，但到18世纪最初25年，它的特点也没有被完全弄清。第一批社仓，出现在直隶省，接着几乎全国各地都设置了社仓；
* 康熙帝1703年，设置目的在于补充常平社（存粮不足）。捐献者可以免除差徭、力役；
* “官置社仓”（广西、山西）
* 乡村粮仓通常由地方管理，受到官府监督，同义仓一样，职能用于赈助粮仓所在地的乡村农人；禁止帮助邻近村社或从不耕作的人。
* 具有借贷性质。
* 尽管清朝统治者坚称乡村粮仓是乡人自己的，但请政府总是有力地控制这些粮仓，出于地方官员甚至中央、皇帝的控制之下，并没有让社长“自治”。
* **因此，常平仓、义仓、社仓都是用来控制灾荒，以维护清朝安全的工具。**

### 乡村粮仓体系的衰败

* 华北、黄河以南省份（湖北）、华南（广东）、西南（四川、云南、贵州）；
* 随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这种粮仓体系、灾荒控制体系变成一个变化多样的大拼盘，其效用程度各不相同。地方机构是否有意愿或能力、官员称职与否深深的影响各粮仓的命运。

### 粮仓体系所面临的困难

#### 存粮之取得

* 常平仓比义仓和社仓在取得上遇到的困难更大。
* 由于存粮来自政府基金购买和富农捐献，给腐败的官吏带来非法牟利的机会。
* 为统治者提供了始料不及的经济问题——过度购买导致粮食价格上涨、“监生”称号可以通过捐献一定数量的粮食得到。

#### 存粮之分发

* 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低效率的行政制度和地方官员的腐败，产生了分发过程中的严重问题。
* 非法手段之一是常平仓的地方官运监守自盗；灾民急需存粮救济时，却因繁杂的公事程序（常平仓坐落在州县城）而不能及时解决。
* 义仓和社仓运作受到官府的监督，其运作受到官样文章的干扰，饥荒期间乡村两村负责人没有取得州县官员的同意，根本不敢动用存粮。
* 确定灾民在什么程度下发救济、州县官员私吞盗用救济粮、发放给偏远乡村的农人、未能偿还接待的赤贫农人 ，都导致乡村粮仓衰败下去。

#### 粮仓之监督

地方管理和政府监督是清朝统治者用来确保乡村粮仓体系适当运作的主要法宝。但实际效果却严重受到地方官吏的危害，存在无能或腐败，使得清朝统治者实际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果不把社仓助于政府监督之下，社会上存在的漠不关心和腐败会导致它们很快失去效用；但如果政府官员干预，原本关心支持社仓的社会领袖，就会撒手不管，出现许多不法行为。

#### 社长之任免

* 粮仓成功的真正原因，不但要有令人满意的地方管理，也需要有效的政府监督。
* 尽管有些官员认真挑选社长，且注重提高社长威望，但到18世纪结束之前，任命社仓管理人也出现**“德者不为，为者无德”**，而且，社长肩负的责任不止繁重，实质上也难以承担。
* 尽管乡村居民经常被任命担任社长，热情或责任感可能不高；有些居民发现担任社长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而热切谋求，更为糟糕。但也不能认为取消官府干预，情况就会变好。

### 绅士与乡村粮仓

* 乡村粮仓也很容易受到当地乡绅和士子的影响。
* 社仓出现于12世纪，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善意的乡绅的努力，是稳定社会局势的有效工具，因此在清代的一些绅士也对粮仓体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 绅：退职官员，士：取得头衔但未取得官职的学者。个人品格，行为方式不一样，素质也是千差万别的。

### 摘要和结论

* 本章讨论了**地方粮仓体系作为清朝控制灾荒的工具为何没有实现承诺**。
* 三大主要类型的粮仓很容易染上各种各样的毛病，大多是由清帝国当时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一是通常腐败又无能的官僚群体，另一个是始终未能改善物质匮乏景况的农民。当时粮食歉收、连续不断自然灾害和人口压力的经济环境，使得大多数乡人始终处于穷苦的挣扎之中，也不能期望贮存一部分粮食应对艰难时期。
* 地方粮仓体系的功能并不令人满意，清朝皇帝不需要为此负特别的责任，因为他们利用传统方法解决古老的灾荒问题，故而不得要领，跳不出造成这个问题的历史环境。
* 当然，存粮体系并非毫无作用。粮仓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减少因饥荒流行而引起危机的风险，有胜于无。
* 需要认识到粮仓体系的运作受到自然、经济和政治各种环境的影响，并不能发挥理论上的作用，势必要随着整个王朝的兴衰而存在或衰败，甚至成为促成帝国瓦解的因素之一。
* “天朝田亩制度”，想象出一种土地分配和财产所有的制度，承诺让所有人共同享有所有农业资源，借以来预防灾荒发生。改变了所有制观念，灾荒救济不是由政府发起、富农相应的慈善事业，二是社会体系本身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他们并没有付诸实施。

### 第六章 思想控制：乡约及其他制度

### 乡约宣讲体系

清朝统治者追随以前各朝统治者的脚步，采取思想控制手段，试图维持对其臣民的牢固掌控。他们发现，强调**社会责任和人伦关系的宋代程朱学派**，是达成这一目的最有用的工具。皇帝们不断表达对孔子的尊敬，过去的儒者只要言行被认为对帝国控制有用，也不断地被神圣化。

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士人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认识到控制士人，就是控制了整个国家；认识到争取到明朝遗留下来，效忠于明朝士人的支持的重要性。——恢复科举制。接连举行乡试、会试等，努力得到时任的支持把他们的思想和精力引上“正途”，使他们不致产生危害统治的言行。

但也没有忽视控制人民大众思想的重要性。他们认识达到多数乡下人都是目不识丁的，用来控制士人的方法对他们并不适用，因此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通俗教化方法——其中最有趣的就是**乡约[[1]](#footnote-1)宣传体系**。

* 应该是**顺治帝**创立的，他颁布了《六谕》（1652年），要求各省区、各旗的臣民不要违背伦理道德，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为了把《六谕》的意思清楚地向臣民解释，每州县都要任命一名乡约，定期向居民讲演。礼部于1659年决定，乡约及其主要助手由各地居民从60岁（实岁59岁）以上、声誉卓著的生员中指定；如果当地没有，也可以选举60岁或70岁以上、名声好的普通人来担任。每月初一和十五，乡约在其助手的帮助下，必须姐说《六谕》，并将其所在灵力之间的善行劣迹记录下来。
* 1670年，乡约宣讲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康熙帝**颁布了知道臣民言行、新的行动指南——《圣谕》，共十六条，成为乡约宣讲的主题。
* 1724年（半个世纪后），**雍正帝**明确说《圣谕》十六条还是简短，无法让“无知乡人”充分理解，于是他撰写了长达10，000字的《圣谕广训》。为了使乡约宣传更有效，清政府在1729年增加乡约人数，除了一名约正（乡约头人）外，还要选出3~4名“朴实谨守者”来担任“值月”，每月轮流协助约正工作。在人口特别稠密的乡、村，必须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作为讲解乡约的舞台。叫做“讲约所”，每月初一和十五进行讲约，乡里的耆老（60岁以上的人）、士子和街坊百姓都要参加。三年一任期满之后，如果约正和值月的工作卓有成效，且诚实无过，那么就会经由各省督抚的推荐而得到相应的奖赏；相反，怠惰废弛者就会受到惩罚。

**乡约还要负责记录其邻居街坊应受到惩罚和值得奖赏的行为。**在清朝统治前期，所有省区都建立了“申明亭”，用来张贴请廷所发布的教诲陈敏的上谕。犯下不法行为的人，尤其是哪些有违孝悌之道的人，起名字就会被张贴在申明亭上；改过自新后，名字才能被除去。该规定的目的，在于加强乡约宣讲的效果，以这种精神枷锁来规范乡人和市民的言行举止，或是他们至少不要偏离它所要求的行为轨道。

**清政府非常强调乡约的重要性，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官员们加倍努力，使乡约真正发挥出潜在的教育作用。**乾隆帝在1736、1737、1743多次发布圣旨，提示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推动乡约制度。1753年，有命令，除了正常的半月一次讲演之外，官员们应利用一切机会以儒家伦理道德来指导乡人的言行举止；在讲演时使用土音谚语，好让乡人们能够理解。此后。秘密社会活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蔓延时，清政府又极其努力地加强乡约（道光帝发布的一系列上谕可以证明）。一直到1865年，同治帝对在乡里中进行讲约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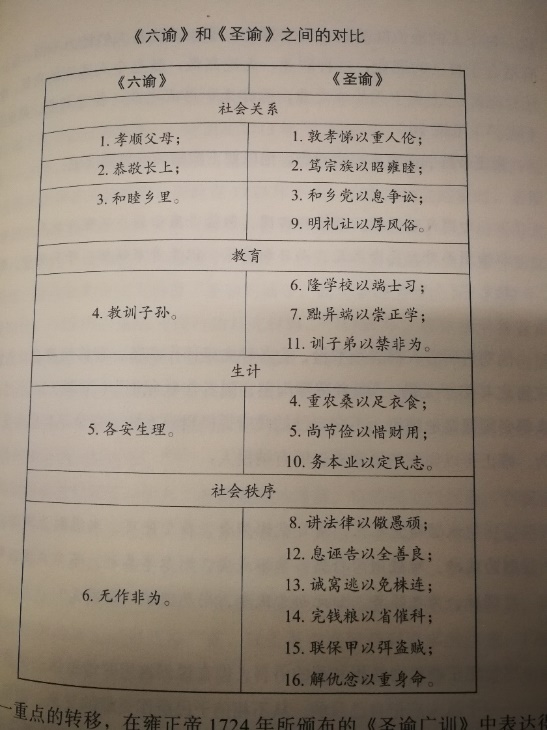
#### 乡约讲习的内容

顺治帝1652年颁布的《六谕》比较简单，内容如下：

1. 孝顺父母
2. 恭敬长上
3. 和睦乡里
4. 教训子孙
5. 各安生理
6. 无作非为

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了。四个方面内容：1、2、3指的是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4是指教育；5是指生计；6是指社会秩序。

康熙帝的《圣谕》要更详细，二者关系如下：



不同在于：《圣谕》更强调**防止犯罪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有人推论不管顺治帝的态度如何，到他的儿子康熙帝在位期间，**官方儒学不再是劝人向善的训谕，而是变成了防止臣民危害帝国的工具**。雍正的《圣谕广训》表达的更为明白，不断阐述如何培养有益于帝国良好秩序的个人态度和行为，即使在谈论其他事情如社会关系、教育和生计的部分。谈论笑道十九认为，小道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父母的爱，还包含忠君和认真履行所有社会责任，***“在田野为偱良之民，在行间为忠勇之士”***（圣训1）。向农人提出劝告（较为激烈的言辞）：

***勿因天时偶歉，而轻弃田园，勿慕奇赢倍利，而辄改故业。……公私输用而外，羡余无几，而日积月累，以至家身饶裕，子孙世守，则利赖无穷。（圣训4）***

告诉所有人要节俭，但都必须慷慨的纳税：

***尔试思庙堂之上，所日夜忧劳者，在于民事，水溢则为堤防，旱魃（bá）则为虔祷，蝗蝻则为扑灭，幸不成灾，则尔享其利，不幸成灾，则又为之蠲（juān，积存）租，为之赈济。如此而为民者，尚忍逋（bū，拖欠）赋以误国需?***

各代皇帝不时发布乡约宣讲，显示出对帝国安全的重视；此外，特别形式的犯罪活动引起了乡约宣讲的注意——特别是秘密社会和非法宗教组织，防止“异端”

#### 宣讲体系的范围

虽然讲约的目的在于教化“无知乡人”，但是**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民族的人**都有机会参加听讲。这一制度很快就在全国推行开来。曾规定所有军营的武官和士兵都必须阐述自己对康熙《圣谕》十六条的心得体会。

#### 宣讲体系的运行

宣讲体系取得一定的成功，归功于一些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有的为皇家文件撰写通俗注解，有的坚持半月一次的讲约会。

一些地方官员认真推行乡约体系，帮助扩大了圣谕的影响。1785年，福康安担任陕甘总督时，要求两省的所有居民，无论穆斯林还是汉人，都必须参加半月举行一次的讲约。

绅士们也加入进来。广东13个乡村地区的绅士，1777年捐资修建了一间大众集会的场所——“公所”，里面“供奉”一本《圣谕》，老少乡人都聚集在里面听讲。

#### 乡约讲习体系的评价

* 在清朝统治者看来，乡约作为教化庶民的工具，**无疑取得了一些期望得到的效果**。
* 如果讲约员措辞巧妙，那么《圣谕》《圣训》华丽的陈腔滥调，也会变得有具体意义，打动一般农民的心弦。
* 讲约员依靠自己个人的能力和热情，也可以对自己邻居产生确有成效的道德影响。
* 乡约宣讲体系或许是唯一把官方儒学的影响深深刻印在广大乡人的脑海中的方法。但同清朝其他乡村统治制度一样，乡约宣讲体系也并未取得统治者所期望的效果。每个生成运作得很好的事例（如前）都有许多个反例存在，甚至，**乡约宣讲体系运作方面的不利陈述占了压倒性的多数**。
* **清朝官员及一些皇帝**总是抱怨，讲约会有流于形式的趋势。中国许多官员的观点也是令人悲观的。早在1694年，推行不就，就有官员记载到，在他那个时期的大多数官员，都把朝廷规定的讲约当做“故事”，只是偶尔举行一下，大多数官员并不想费力修建一个固定场所，而选择佛庙和道观。皇帝也会也总是抱怨乡约讲习体系不理想***“朔望宣讲，止属具文，口耳传述，未能领会”***（乾隆帝，1740）、***“近年以来，各地方官员历久懈生，率是为奉行故事，竟至日形废弛”***（嘉庆帝，1809）
* 19世纪的西方观察员未发现讲约体系是一项有效工具，***“官员不过是走进来，喝杯茶，然后就走出去了”***（古伯察，1850）；***“官员讲述圣谕圣训的制度，已经堕落成‘无关痛痒的无用之物’”***（威廉·盖洛，1904）。

无论乡约宣讲体系的内在优点是什么，大多数中国官员和相当一些皇帝都对它的运作情况极为失望。

* **推行的一大明显困难**就是直接负责推行乡约讲习体系的普通官员能力不足，或没有时间精力来操办这件事。帝制中国官员具有好口才的很少；州县官员会严肃认真对待征税、镇压土匪、调查谋杀案件和诉讼之类的事情，但很容易忽略半月一次的讲约会。
* **挑选令人满意的讲约员绝不容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擅长“八股文”，但很少是好的演讲者，无法让“无知乡人”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 **根本阻碍，是广大的中国民众生活在其中的恶略环境。大多数乡人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社会地位低下。**圣谕宣传和谐、勤谨、节约、忍耐、养成良好习惯、遵守法律；要求富户考虑他们贫困邻居的生活需要。事实是，粮食产量并不能满足所有人民的生存，天灾人祸致使大多数人处于悲惨境地，另一方面有特权的家庭靠剥削贫苦大众利益致富（尽管这种支付只是有限的）。**践“德”行义变成了没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 乡约的变质

同保甲、里甲相同，乡约讲习体系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况：在某些时候在不同的地区，他取得了教化乡人和市民**以外的广泛功能**。

* 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时间的推移，清朝统治者原先指派给它的目的大多被忘掉了。约正、值月越过它们作为教化者的职责，编成了当地争端事务的仲裁人。
* 取得了保甲制度的功能，从思想控制工具变成了治安控制工具。18世纪之前就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进入19世纪之后，从宣讲体系转变成治安工具的步伐加快，许多地方官员提到乡约时，好像它就是保甲、当做保甲来看。***“各州县设立乡约，原为约束乡里，稽查牌保，如有盗窃及不法匪徒，即应送官究治”***
* 吸纳了“团练”的保卫职能，利用乡约的架构组织团练。例如，广东，“忠义营”、“忠义乡约”抵抗“黄头贼”侵袭。

### 乡饮酒和其他敬老的方法

#### 老民和老农

传统道德要求尊敬长者，成为思想控制的又一有用工具。

* 树立永久政策，对到一定年龄的臣民，给予物质上的赏赐或津贴。老农就是上了年龄的居民；老人就是上了年龄的人。但很快被腐败的地方官吏及走卒破坏。
* 授予非物质性荣誉。例如，把官衔或品级授予地方官推荐的长者。存在谎报年龄等欺骗行为。

但由于欺骗、腐败等行为，“恭敬长上”成了一句空洞的话。

#### 乡饮酒

简称“乡饮”，是社区的饮酒仪式，也是一种思想控制手段。

一月十五和十月一日，全国各省举行乡饮酒活动，由当地主要官员主持，一位德高望重长者作为“大宾”/“正宾”，次要者介宾，再次者众宾。仪式开始，把酒倒入仪式杯并宣读相关律令，主人和客人喝完第一杯酒后在大厅中央安放“律令案”。

整个过程虚假、僵硬。并不是欢乐聚会。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出席很少。

### 祭祀：地方祭祀。

#### 官方祭祀的目的和形式

* 目的：通过祭祀，加强其他控制居民思想的措施。
* 形式：清帝国首都建造庙宇、神殿和由本人来祭祀的祭坛之外，还在各州县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祭祀，要求官府并鼓励居民参加。可分为“大祀”（主要祭祀，祭天祭地）、“中祀”（中等的祭祀，祭以前各朝帝王、孔子、关帝等）、“群祀”（其他各种祭祀，风神、云神、雷神等）。
  + 这些祭祀对象可分为：

为表达内心感激或尊敬而祭祀（孔子、关帝）；

祈求带给自己好处或保护而祭祀（风神、云神、社稷神）

追求崇高道德精神或服务精神而祭祀（名宦乡贤）

担心没有适当安抚会被激怒而降下灾祸的神灵（无祀鬼神）——宗教控制思想

#### 控制宗教的效果与困难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人民大众接受清政府主办的祭祀，绅士和士子经常共同努力，修建或恢复庙宇，举行祭祀“文章”（即文曲星）的活动等，普通百姓对政府发起或统一的其他种类的祭祀感兴趣。乡人非常尊敬那些他们相信能左右自己日常生活和生存的神灵。但存在地方祭祀滥用的情况。

#### “邪教”

邪教就是威胁清政府统治的教条，清政府对一系列宗教活动十分警惕，也采取了例如禁止颠覆性宗教活动等重要措施。

清政府实施宗教控制的效果，取决于清政府获得或维持最低程度的经济与社会稳定的能力。

### 乡学

#### 书院、社学与义学

对士大夫进行思想控制的“科举学校体系，这样就可以通过他们对广大乡村大众进行统治。

* 对学生进行系统教育、由清政府建立或经过其批准的各种学校，可以分为两大类：“官学”（官办学校）、“学校”（非官办学校）。前者是皇族子弟、八旗子弟和拥有世袭头衔之家庭子弟等所办的特殊学校；后者包括书院（学院）、义学（慈善学校）和社学（乡村或大众学校）。
* 书院：统治者给予书院（起源于唐朝）有限经济支持、规范其运作方式等办法，当做思想控制工具。从一开始限制书院数量，到后来的放开对地方书院数目限制，几乎每一个州县都有疏远。地方书院为清朝同治提供了一些帮助，：学习场所、补贴、科考指导。
* 社学：“每乡置社学一区，择期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社师有报酬，还可以免服劳役，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政府资金创办和维持。
* 义学：为“孤寒生童”提供读书场所，教化特殊类型的人或特殊地区的人。同社学基本目标相同：为物理上学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实质是把更多的人置于官方儒学思想控制下。

#### 作为控制工具的地方学校

清政府在方方面面做了规定，使学校教育服务于清朝统治利益：

* 清政府编纂教材，课程安排主要取决于国家考试所涵盖的内容；
* 士子想成为生员，必须默写《圣谕广训》；
* 为了保证儒学权威不被挑战，士人都不能出版自己的作品、小说；
* 不时颁布规定与禁令，以求达到对士子更加完全的控制，让他们在行动和思想上都无害。

#### 控制乡村生活的效果

评价清政府通过学校控制进行思想控制的效果，便利的方法是分别评估它对那些受书本规则影响的人和那些不易受影响人的影响，即对受教育的士子、大量目不识丁的乡民的影响。

* 对士子的影响
  + 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长年累月埋头于“苦读”的士子生涯——一些知识分子受儒学影响太深，对任何改革或革命观念思想无动于衷。
  + 越来越多的士子对朝廷不时颁布的措施和指示阴奉阳违，公然违背清朝法律或反对钦定伦理道德，背离清朝规定的行为方式。“劣生”、“刁生”。
* 对乡民的影响
  + 很少有乡村学校是真正和持续兴旺的。地方官对其态度冷淡/精力不够，政府给予资金不够、乡村大众普遍贫困。
* 结论

清政府通过科举考试与学校制度对乡村进行思想构以确保对乡村的统治并未取得显著成效。无论怎么说，这个体系的困难和缺陷在19世纪变得日益明显。

**一方面，通过地方知识分子来控制乡乡村大众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清朝并没有培养出足够多的可靠士子，来协助进行乡村层面的思想控制，也未成功地防止“劣生”出现。正是这种“劣生”的行为举止，破坏了清朝统治的威望，使本来已经不平静的乡村更加动荡，从而在实质上削弱了清朝的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乡村学校并没有把思想控制的影响带给足够多的乡村居民**，其部分原因在于乡村学堂运作得并不好，部分值因是乡人无力或不愿将子弟送到这种学堂读书。因此，广义地说，在清帝国地域广阔的乡村地区，存在着思想真空。乡村大众除了关心自己日常的生活困难之外，对任何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他们既不愿积极效忠现存政权，也不愿反对它。他们一般都相信命运，顺从上天和神灵的安排。他们艰难地忍受着，努力使生活好过一些。就算清朝竭力推行的思想控制也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原本就是平静顺从的。

**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思想控制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只要它对乡村大众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通过乡村控制以巩固帝国安全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只要它对士大夫产生了效用，就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削弱帝国的体系。这种两难之局，是这种体系的固有属性，因而在这种体系下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 乡村控制的局限

评价各种乡村控制机制对清朝统治所起的作用，并概括性地解释限制它们运行的因素。

* 评价
  + 17、18世纪期间，乡村控制体系**看来对清朝的相对稳定做出了实质的贡献**，此时历史环境也比较有利，这些机构只需协助让各阶层人民普遍服从统治。
  + 基层统治体系**并不完全有效**。民变或“匪”此起彼伏、跟税收相关的逃税、欺骗敲诈，一直在烦扰清政府、地方粮仓，乡村学堂和乡约宣讲制度从未在全国范围内某一时间点真正发生作用或维持一点相当长的时间。
  + 乡村统治体系的部分功效也并不是一直都存在。到19世纪中叶，乡村统治体系的实际作用已经丧失殆尽，米有什么利用价值，无论是乡村治安体系、思想控制体系、灾荒救济体系，还是其他控制工具都无能为力。
* 限制因素
  + 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居民来运行控制机制。没有培养乡人的能力和志愿。一旦社会危机和动荡爆发，就会严重破坏“社会安宁”；
  + 地方官员令人失望的素质（以帝国控制有关）

前六章讨论了清代乡村统治体系的理论与实际，评估了对清政府的用处，随后章节追踪对乡村军民及其生活方式的控制的效果，并描述他们对控制的反应。希望这样的讨论能更全面展示乡村控制对帝国整体的影响，更准确地评价这种控制作为帝国专制政体下维持政治稳定的工具所发挥的作用。

## 第三部分 控制的效果

### 第七章 乡村控制的效果

### 作为共同体的村庄

对于村庄本质的两种认识：一是村庄是民主的，因为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公共事务掌握在村民手中、领袖的作为并没有得到官府直接的授权；一是认为村庄不具有民主性，因为受到政府的潜在干预、事务一般是寡头的或者贵族左右、领袖得到官员的认可。二是因为政府无力控制，但是当政府认为有必要对乡村生活进行控制时，政府也不曾犹豫过。 且村庄经常受到宗族或者乡绅的控制。本书作者基本赞成第二种观点但不是所有的细节。不是因为村庄不受干预，

### 村庄领导

* 村庄领袖的种类

一种是经过正式程序任命的，一种是未经正式程序涌现出来的。 正式领袖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在基层的代理人，是位政府服务的。因此很难被视为真正的领袖，非正式领袖才是受到居民的拥护。

村中长老其中之一，村庄公共事务中的内部事项都掌握在长老手中；第二种是靠天生的才能和后天的成就获得地位的；第三种是天生的领袖，依靠人格和聪明才智。非正式领袖需要依靠政府正式领袖的支持，是村庄自己的领袖，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比正式领袖大。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来自社会地位和个人的威望。正式领袖履行职责一般是有金钱报酬的。非正式领袖的则直接避免金钱的报酬。

* 领袖的挑选

村庄的正式领袖通常都会是**由地方官员推荐而任命的**。但是不能假定是一个民主选举的程序。资格是有闲暇、有能力、有品德、老辣。而且可以废黜换人。

非正式领袖进入领导层依靠的是年龄、财富、学识、家族地位和个人能力。他们是被承认而不是被选举的简言之，村庄领袖一般都是地位突出、有势力的乡绅或者士子。

### 村庄活动

村庄活动的类型和强度受到村子大小、位置以及一般环境不同的影响。不能因为某一个例子认为一般的中国村庄是有组织并且充满活力的村庄。但是活动一般是为了地方利益，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祉和村民生活的改善。而且村民的参与仅仅限于出劳力或者钱财，关于点子等问题是绅士的作用。

* 宗教活动

宗教活动一般爱庙宇内举办，但也有例外。庙宇的大小合村庄的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有时候庙宇承担了宗教之外的职能而且宗教活动通常是由少数居民领导控制的，对于乡村大众而言，这些活动仅仅是得到一些预科或者宗教满足

* 经济活动

最常见的集体活动就是桥梁和道路的兴修与维护。资金的来源包含政府、村民和乡绅三个部分。

乡绅经常提供桥梁、道路的服务。村村民承担的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水利和防洪工作。乡绅对水利十分热心。

有时候地方官不会采取配合的态度，会逃避自己做的职责，甚至榨取钱财，乡绅在主持修建水利工程时也会存在类似情况。还有一项活动是守望庄稼，需要村民自己组织。

* 与地方秩序相关的活动

村庄自己领袖的职能：解决地方争端（但并不是所有的仲裁都是有效的且不都是公平公正的）、执行村庄的乡规

* 地方防卫

处于防卫土匪保卫扥估需要，村庄建立起自己的防卫组织，称为乡勇或者团练。一般由乡绅组织发起。这些组织的主动动机是防卫，但也会存在别的动机，因此对其的态度比较微妙。也会存在一些绅士利用担任团练负责人的特权增加对民众的压迫。

### 村际活动

包括两类

：一是通过领袖讨论共同的问题，而计划则是各村分别决定和实施；

二是各村在影响共同福祉和满足共同需求的事情上合作，统一行动，第二类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比如水利工程的管理、守望庄稼、

为行人提供免费茶水及片刻休息的亭子、为附近村子提供服务的市集，此外村际活动还延伸到宗教互动以及共同防卫的事情。对于村际之间的争端，通常召开村际仲裁解决。有的村落甚至还成立了跨村的一些组织。

### 村民的合作活动

不同于村庄互动，是由部分村民私下发起的，仅仅是为了满足某些需求。第一种是香会或者烧香会。山会 （为了筹集资金去远处进香）；或者是举办一些宗教活动。第二种是借贷会（合作金融的味道），第三种是丧葬会。

### 绅士在村庄中的角色

南方的绅士比北方的影响更大 且村子相比而言也更加繁荣。

一个村庄有限的组织和活动，绝大部分取决于绅士的领导。但是绅士阶层和清政府不是相对的，但是有时候也会是捣乱的作用。即使有政府的禁令，一些绅士的行径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这使得在动乱的年代，绅士不再是政府控制乡村的代理人。，相反的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 总结

清朝对乡村并没有实现完整的控制，各种村庄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地方利益；但是只要这些活动与村民的集体利益相关，就会是稳定的因素，反之则是引起动乱的因素。即使是没有实现完全的控制，但中国村庄绝对不是民主和自治的村庄。清政府在某种程度山是刻意留给村庄或者村民有限度的自由，从而可以利用他们完成某些任务，但也给不安定的因素提供了空间。

乡村的人口不是同质的，可以分为绅和民 地主和佃农。 二者产生的冲突阻碍了村庄自治的发展。但是在有些地方，特别是华南，家族组织经常把村庄凝结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单位。其存在使得村庄的组织模式稍有不同。

### 第八章 宗族与乡村控制

### 宗族与村庄

族是一个共同血缘关系的群体。宗族和村庄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有些村庄是是宗族聚集的结果。所以村庄和城市不同。一个是以行会和市民为典型，一个以宗族和血缘为典型。两种不同的宗族村庄，一个是单族村庄，一个是多族村庄。单族村庄咋南方比较普遍，多族村庄在北方比较常见。但族村庄和多族村庄的区别反映在组织上的一些不同。单族村庄，宗族群体和乡村地区实际上是一致的，，村庄领导也是宗族领导；但是在多族村庄则不是，村庄领导和宗族领导是分开的。多族村庄不见得会比单族村庄更加平等。

为何19世纪中国各地宗族发展程度存在这差异？历史环境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 成员与领导

宗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绅士成员，绅士一般情况下控制了宗族，而且宗族内部可能也面临着巨大的差异。同一宗族内，绅士和平民之间有别，一个是支配者，一个是被支配这。虽然宗族成员间的社会差别造成了不平等，但是绅士成员尝尝满足与祭祀的特权，而且经常会施恩与贫困族人。

宗族结构的细节各不相同，但是都会有一个领袖 建立一个管理或者处理宗族事务的组织。族长 宗长等，比较大的宗族还是设置副族长等。年龄、较高的辈分、个人才能使族长的主要条件。但是社会经济地位也同等重要。

### （三） 宗族活动

* 族谱

基本是绅士的工作，记录和追踪宗族的谱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宗族都有族谱。一些比较繁荣有社会地位的人才会修建族谱。族谱的内容给可以十分详细，包括家族诞生以来的历史等等

* 祭祖

这个活动往往比族谱更加有吸引力，整体的祭祀和个别家庭的祭祀必须区别开。而且祭祖也免不了绅士的控制。祖祠、宗祠以及祭田是绅士关注的首要目标。官员和士子一般乐意捐钱而且也有较大的权力。宗祠和祭田与各地的经济状况有关。祭田在南方中国可能相当多，达到正常耕地的75%。祭田的收入用于族内的公共活动。

* .福利事业

用宗族财产产生的增值所得或者宗族的粮仓所储藏的粮食帮助或者救济年老和贫困的族人。但有时宗族给予成员的帮助是以借贷的形式出现。宗族也会承担起修建灌溉水渠、蓄水池和桥梁的任务。水利有时候也会由宗族共同兴修

* 族人的教育

对于显露头角 对学习充满激情的孩子 家族经常予以经济帮助；许多宗族为年情人特别是贫困家庭的成员创办学堂。

* 秩序与道德

规模较大和组织较好的宗族会费心的维持完整的秩序与道德。制定宗规并且宣讲，奖励和惩罚十分清楚

* 自卫

抵抗暴徒、土匪以及其他人的乡村自卫任务，有时由亲属之承担。宗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以武力对抗官府代理人。

关于宗族活动的一个劲结论就是宗族活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村庄活动完全相同。

### 政府对宗族的控制

清政府将宗族作为一个控制乡村的工具，鼓励宗族团结，同时对于一些不守规矩或者有害于帝国统治的宗族进行严格的控制。后来宗族获得了法律地位，被置于官府的直接控制之下。19世纪的一些官员利用宗族对付反叛者。由于政府的推动，种族中国出现了双重领导的局面。但是由于宗族利益和清王朝的利益不一致，所以并没有很好的达到目标。 还有一些宗族冒认自己的祖先以抬高自身的威望。还会出现滥用修建宗祠和购置祭田的特权也受到官方的镇压。

宗族可能是稳定性的力量，也可能是动乱的根源。

### 宗族组织的衰落

随着19世纪动荡的开始，宗族的繁荣也过去了。家庭财富难以预测的变化是宗族衰落的一个明显原因。衰败的表现：祠堂变成了废墟、祭田遭到了挪用或者非法处置。宗族财产被盗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宗族内一个核心人物没落可能就会导致整个宗族的没落和分崩离析。宗族的瓦解当然还受到内部一些因素的影响，由于宗族的团结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比如逃税、侮辱祖先 对外外人时，产生争吵甚至械斗、宗族的世仇等。即使没有世仇的地方，宗族也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大的宗族往往会欺负较小的宗族。

一些地方的宗族还会从事抢劫和掠夺行为，从而干扰社会秩序。、

宗族组织和村庄组织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在受宗族支配的地区，这两个团体领导权经常掌握在一批人手中。存在于村庄中个人和团体之间的不平等，也会出现在宗族内。实质上，宗族加强了这种不平等。宗族使得居民的凝聚力更大。尤其是单族村庄。对于清政府而言，宗族试一把双刃剑。

### 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一）

### 乡村居民的一般特点

一般对于中国民众的看法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农民是热无害的、热爱和平的，也是政治中立的产物；一种认为中国农民是敢作敢为的。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是过于简化的，不能说明实际情况。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农村有着不同的经济结构，并且时间地点是不一样的。中国乡村的居民分为绅士和普通人。两者又大致可以分为正绅和劣绅，良民和莠民。

良民包括农民、工匠、小商贩和其他依靠自己努力或者智力谋生的人。他们基本是顺民；莠民大多数是无业游民，其中也包括让人变强的工作；社会的动乱是莠民和劣绅一起的结果。帝制下的中国农村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是一个多元的广阔的舞台。上面点缀着大小不一、组织程度不同的村庄以及社会、经济和心里都不同的人。

### 乡村环境

* 经济条件

中国各乡村所处的环境并不相同。条件有力的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较好。在环境较差、自然条件不太好的地方，乡村经济比较萎缩，农民的生活比较困苦。虽然一些文字资料描述了乡村环境的物质维度，但是并没有反映出这个环境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的、社会化的和政治的。尤其是人口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

从清王朝建立到19世纪中期，人口是稳定增长的的，，虽然耕地也是在增长但是并没有达到与人口增长一致的速度。不平衡的增长最终导致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政府采取措施：鼓励耕作、开垦荒地 。乡村人口过剩是基本态势。进而导致的对生计的需求是基本你的问题。18世纪最后几十年和1820年间，粮食价格涨了一倍、土地价格也呈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小地主和佃农的环境即使在平实也不是很好的。土地集中使得农民的生活更加窘迫。大地主拥有了更多的土地，的确会为地方经济带来某种利益，但作用确实不大。

* 政府与土地问题

清王朝的皇帝们总体上倾向于支持特权人士，保护地主的利益对抗佃农的侵占。原因是处于维护统治党的需要。事实上，政府一直保持着不干预的政策。但是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缓解这种情况。比如鼓励开垦。通常小地主承受的税负比绅士和大地主的还多。清政府对于所有权和收租的权利给以完全的法律保障，同时防止无地农民的境况悲惨的难以承受。原因是地主是缴纳税负的对象。但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碰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动乱。

* 乡村的衰败

19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走向衰败，原因是不发生的灾害、社会大动荡、腐败的官僚。许多村庄变成鬼镇或者鬼村。华北地区的灌溉设施任其毁坏，但是也有一些省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繁荣景象。对于经济衰败的原因，有人总结道一是人口多、二是这些地区的居民普遍吸食鸦片。特别是山西和河南。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整体环境险恶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以各种方式给城镇或者城市带来好处，但是却极大的危害了村庄的经济。

衰败的迹象包括：由于人口迁移或者放弃农业生产带来的乡村人口脱节。还有人口移民海外；另一个现象是各种原因造成的农民失业。还有难以忽视的自然灾害的作用。清政府虽然着手应对水旱造成的紧急情况，但是措施效果非常有限。即使是发生了最严重的灾害，但是居住在乡村地区的绅士和富户大概都侥幸下来，没有和地位差的村民一起死去。

反叛和民变本来是悲惨环境的部分产品，反过来又促成乡村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清政府采取的军事行动往往比贼的行动来的大。战争对北方乡村的影响具有毁灭性。

### 西方对中国乡村环境的影响

西方对中国乡村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而且本质上都是经济的，不是知识的，影响的强度在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

西方影响的一个方向就是城市资本下乡流入农业生产的省去，使得土地所有权变得更加集中，土地价格也上涨。另一个影响是西方工厂等的修建和国外商品的涌入使得失业的村民被雇佣，缓解了严峻的经济形势。最终洋货泛滥。对乡村经济的灾难性打击，织布机和纺车工匠受到的打压最大，吸食鸦片日益普遍、使得银子的兑换率上涨。所以西方工业对19世纪中国乡村各个方面的影响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危害而不是好处。换句话说乡村环境的恶化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 第十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二）

### 良民

持续的专职统治、普遍的恶政、总体的贫穷以及不识字 使得一般的浓密坚韧、冷淡、温顺葱丝成为良民。但是一般不会挑战王朝的统治

### 莠民

作者的研究要说明：

1 一般农民大中是温顺的，但是在环境的逼迫下会突然采取暴力行动，因此有时是良民，有时是莠民；

2.乡村中有些疼压迫良民成为莠民；

3.当绅士和王朝的利益不一致时，会煽动或者逼迫良民参加暴力行为；

4.虽然农民本身可以是暴力的，但是只有加入反叛的乡绅成员，才会持久和大规模的起事；

5 王朝行政体系的无能和腐败使环境进一步恶化。

他们的行为是暴力行为，大致分为四类：

* 争门：

不同村庄或者不同乡村居民团体之间不同暴力程度的公开冲突。在严重的冲突中会使用武器，小规模的战争会演变成门争，持续数约或者数年。官方成为械门。

原因:为了女人争风吃醋、物质利益的冲突享用水利或者防治洪水）、宗族之间的冲突、土著和客户或者客籍的冲突。

绅士在争门中的角色：争门不是全部出现在一般农民之前，其中一些争门特别是家族卷入的情况下，绅士的作用非常明显。农民经常与绅士合作，由绅士充当领导者。如此，争门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和平时期的村庄活动模式。

不同人群之间的冲突：佃农和绅士之间或者地主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尤其是当绅士或者地主比较严苛的时候。在反抗过程中佃农具有人数多的优势，但是往往组织程度不够，而且没有很好的领导者。有些奸民或者恶棍会充当领导角色。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关键，有时候可以平息事件，但有时候则可能扩大冲突。官员的素质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佃农和地主的冲突外，还有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冲突、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冲突、

* 暴动：

暴动指的是乡村居民为反抗地方官员所采取的暴乱行为。但是由于争门也可能发展成为暴动，所以有时候并不是很好的区分二者。

暴动一般是针对地方官员的，对于中央政府或者皇帝而言并不反对。暴动和造反不同。造反的目的是占领或者推翻统治，而暴动往往是处于发泄心中的愤怒，或者满足某种需要。

但是对于民众认为的好官，他们也会十分的尊崇。方式包括作诗、向上级政府请求留任、立宗祠或者碑、送别的时候宋伞等。但是有些感激的场面是绅士运作出来的，没有反应民众的意愿。而且还会出现官员自己运作的行为。就绝对数量来看，好官不多。当暴动发生时，军事力量的接入往往使得民众得不到什么好处。虽然政府不支持军事力量的介入，但还是难以避免。

* + 暴动的种类和原因：反敲诈勒索之暴动：州县官的司法裁判不公正是地方暴动的普遍原因。最频繁最重要的原因是与征税有关的官员的敲诈勒索。这种暴动在清代之前就发生过，但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地方武力的出现，更加严重此类暴动也不是为了反抗中央政府，更加的比重是指向地方官员。

一般发展过程是提出请求、高一级官员未能减轻痛苦、发生暴动、军事行动镇压或者采取某些妥协办法领导者遭受惩罚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转为大规模的叛变。

* + 因饥饿而暴动：政府无力很好的处置饥荒问题而引发的，可能传染到其他地方。暴动的目标和反敲诈勒索的不同，既可能针对地方官员，也可能针对当地的富户。目标很简单就是为了饥饿问题。但是往往会遭到镇压，一旦被土匪等人士利用，成为威胁帝国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
  + 绅士在暴动中的角色：绅士可能是普通民众发泄仇恨的对象，也可能是扮演煽动或者组织者的角色。两种情况下绅士和费绅士的富户成为暴动的对象：作为粮食囤积者，在饥荒时被居民攻打；作为土地所有者和纳税特权者。

绅士或者文人参与暴动的原因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为了自身的名望与声誉、在科举考试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绅士在暴动中板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一方面是因为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一方面是读书识字、他们额可以雇佣一些佃农或者匪徒 。甚至可以买替死鬼。

* 盗匪：

个人或者团体利用暴力对乡邻进行的掠夺性行为。盗匪或民变或者叛乱的区别还是十分清楚的。

产生的根于是贫穷。但是饥饿不一定会产生盗匪，需要两个条件：奸民的出现、特定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不安。

饥饿的农民首先走向暴动和盗匪，最后参加了民变。动乱的社会中，麻烦制造者的运作是盗匪兴起的重要因素。

奸民:和良民相对，倾向于不守规矩、喜欢掠夺。主要包括光棍（村庄恶霸）、秘密社会会员和散兵游勇。恶霸和恶棍的行为不仅仅以打门或者吃喝为乐，从勒索到敲诈，种类十分广泛。光棍很容易成为无法无天的抢劫者，，当他们制造的麻烦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当局的关注。一些地方，奸民可能失去乞丐，但是往往会用暴力手段榨取钱财。不应该忽视的是特殊情况下一些政府军可能从事到非活动，因为当兵的可能可能就是农村地区的渣滓。解散后变成散兵游勇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盗匪的根源虽然在于贫困可是如果没有奸民胡总恶化大的冬款，盗匪活动也不会很猖獗。

职业性的土匪和偶尔为之的土匪：偶尔为之的土匪往往是被迫的，职业性的则是习惯于掠夺无法无天的分子；一旦压力消失，他们还会回归到平静的工作，但是职业性的土匪则永久的从事这一活动。

* 造反：

指的是对既存政权的公开武装反抗，目的是要推翻它并且用新的政权代替他。但是与革命不同。革命是要建立新的政府组织形式和依据以建立的原则。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着造反的权利这一观点。在许多事件中，民扮演者推翻王朝的工具。但是这个理论把民广泛的比喻为造反力量时没有考虑特殊的情况。内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层。如果假设民会行使造反的权利，但是如何解释普通的民众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呢个？

所以需要对民进行分类讨论。

* + 造反的原因：普遍的穷困、腐败的行政、经济的不公是显著的因素。对行政腐败的痛恨，是叛乱者证明自己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因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最常见的是种族仇恨 反抗蒙古 反抗满族统治者；个人野心；
  + 普通百姓的角色：没有指定计划、提出主张的绅士和提供体力的普通百姓合作，任何造反都无从谈起。这一点可从秘密社会组织吸收绅士和文人成员看出。 绅士和普通百姓是参与的主体，普通百姓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识字的（有雄心壮志但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参加没有通过的儒生、因职业关系而识字的人）、不识字的人（具有不寻常的报复、才能、精明或者积极进取的人，称作特别的平民；习惯性桀骜不驯、目无法纪和好吃懒做，平实就是地方上的恶棍、游手好闲者，称作奸民）。在任何时候都占少数，普通的老百姓才是多数。所以农民在造反中扮演的角色就是充当叛军或者普通士兵。

老百姓参加造反原因：迫于环境、受到造反阵营的引诱与试压。 所以在某系程度下，农民参见造反可以说是或多或少是自愿的。所以造反领导者一般不会对他们很信任。但终归比政府对=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好些。造反的主意是绅士和识字的平民想出来的。失意的士子也会在造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士的效劳在造反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 造反对农民的影响：普通农民得到的物质利益是很少的，战后的破败十分严重，造反者一般会劫掠等等。即使是建立政权后，统治下的百姓不见得过的有多好。造反者不能总是从乡民那里获得支持，还可能遭遇大抵抗。（太平天国的例子）

### 西方的声音

* 一般影响

19世纪初期以及之后的几十年，西方宗教、技术、商业和其他方面欧洲文明的日益涌入增加了混乱的因素，加剧了内部的危机，直接促成了争门、暴动和造反。

宗教的传入使得争门的发生带有宗教冲突的色彩。外来宗教之间的冲突

* 排外暴动

产生的原因：中国人的优越感、西方人的奇怪和有时肆无忌惮的行为、西方商业的入侵、鸦片的日益普遍 。

绅士和普通百姓对此的反映并一致 。文化反感是绅士的决定性因素，而切身的经济利益冲突更加可能引起百姓的敌意。但是绅士总是在反外运动中扮演发动者或者领导者而且大多数排外运动都与绅士有关传教士自然是排外的首要对象。鸦片烟的日益普遍使得上层社会认为外国人贪得无厌。普通的老百姓则是因为自身经济利益的冲击。轮船航运是另外一个因素，导致了从事内河航运的人的失业。在于外国人普遍接触的地方，可能民众对外国人更加不友好。

* 绅士与文人在排外暴动中的角色

绅士负责发动和指导 普通百姓负责提供体力，三里元扛英斗争就是例子。排外暴动很多都是衙门煽动和鼓动的。华南地区一些书院的社学是1840年代反外运动的宣传中心。但是不能假定所有的绅士对待外国人都是不友好的。传教士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假定官员和文人在反外运动中总是合作也是不正确的。反外暴动降低了清政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削弱了对中国乡村的控制。

* 与西方列强的战争

西方列强19世纪发动的对中国的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一是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失败，颜面丢失威望下降，二是为了抵抗西方的列强入侵，华南一些地方武力组织让奸民敢于公开向清王朝挑战。

西方人和文化的涌入从外部加速了清朝的败亡。但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各自占了多少比重则难以弄清楚。但是通过引进宗教、教育和政府的新观念以及制造和军事的新技术 优势的武力等西方列请无意间帮忙终结了原本好像永无止境的王朝循环。

### 第十一章 结论与余论

### 乡村控制的合理性和效果

乡村控制体系是统治者对环境挑战的一个产物，也符合帝国体系自身的本质。对于广大的领土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稳固，自然需要一个统治体系。所以设置出各种制度或者体系。通过不断招新的官僚体系和设置军事力量，帝国强化了统治，但是由于面积太过广大，所以需要设置一个基层行政体系对广大的乡村进行控制。

对于地方人士、乡村中既有的组织、绅士以及文人统治者一方面是利用，一方面是不信任导致的限制、监视社甚至利用。所以这种控制体系就难以稳定。

尽管这套体系设计的精巧，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乡村控制需要有两个前提前提条件： 一是 有一个相当可靠、能干的官僚集团 二是大体上稳定的乡村环境 。当这些条件存在时，乡村控制的就比较好，如故不过条件不存在，那么就乡村控制就不好。而且有利的环境并不会一直存在。

### 专制统治的局限

行政的腐败是造成乡村控制体系衰败的关键性因素。那么清政府能够防止腐败的发生吗？

作者认为是不能的。由于皇帝们不信任自己的臣民，所以建立的严密的监控体系。当面对冲突时，帝国永远会把安全放在行政效率之上。结果官员由于没有足够的权里，因此往往不会做出主动的、独立的判断进而执行行为。所以，一般官员明智的做法就是尽量少承担责任，尽量不惹事。

清政府的政策虽然完全符合专职统治的需要，但是却造成了政府的效率低下。官员不会主动承担任务，而且处置事务的能力也不够。 此外由于远远薪水较低，难以避免官员的贪污和腐败。

此外，还存在的问题就是政策效率的降低。政策或者命令从中心到外围的传达，威力往往会降低。不同的人群利益之间是相互矛盾的。 尤其是确认绅士和文人的精确地位是重要的。士大夫的利益不一定和皇家的利益一致。 而且绅士只有一小部分在政府里服务，不一定终生当官。这批人首先考虑的是自身或者家庭的利益。绅士和文人对现存政权的态度明显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

清政府由于仅仅是将大臣培养的消极而柔顺，但是最终没有完全损害积极行动的能力，使得他们不能够应付严峻的生产环境。

### 农民的角色

农民在无论是在承平时期还是在动乱时期都是受苦最多的。虽然他们贡献了体力，但是无论自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他们活动的最少。往往成了无名的尸体。中国历史上推翻王朝的运动是人们动机和历史环境的组合，从来不是某个单独群体完成的。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号称为了农民利益的行动中从来都不是唯一为了农民的利益。

造反或者革命的领导者有充分的理由诉诸农民的愿望。因为农民人数众多且又强壮有力。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体系下的农民在态度或者行为上有些根深蒂固，活下去的意志左右他们的行动与反动；耕种土地以维持生存占去了他们的注意力和精力。王朝更替他们并不关心。即使是共产革命也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它是学生、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领导的迎合农民需求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进口的。他们的领袖有些教育水平极高，曾留学海外。在某些方面可以与绅士相提并论。在他们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儒学，无产阶级额革命取代了造反的权利，成为摧毁现有政权的理由。

共产党是专制统治者，但是他们的统治方法改进了，但是基本的目的和控制的根本原则基本上是相同的。通过思想、经济以及行政的控制让政权永存。共产当的思想控制面临的困难也很严重，引进的是国外的思想而不是本土的儒学。中国历史和组织的动力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终将比共产党人能够利用的所有宣传、所有教条和所有活力都要大。但是这种统治能否持久，作者认为现代研究为之尚早而且与本书无关。

感受：

1. 汇报了本书第一第二部分。本书十分详尽的勾勒了中国乡村的面貌：在行政区划与基层统治体系上，填补加强了之前许多的历史空白。
2. 本书对资料的详尽列举与使用值得学习借鉴。

1. 一指在乡里中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二指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 [↑](#footnote-ref-1)